

桂林市党史通讯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资料专辑



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
1992

卷首语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设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同时，又是我党的一个秘密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它对外(公开)承担抗战支前的交通联络，筹运军输物资，接待输送抗日人员等任务。对内(秘密)负责与八路军、新四军军部，湘、粤、赣、香港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联系，并直接领导广西地下党、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开展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1月20日，桂林八办被迫撤销。它在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等单位，对桂林八办的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并编印了一些书籍。1991年，在广西军区军史编研室和原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的主持下，在原桂林市委党史办公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参与下，共同努力，完成了全军《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军史资料系列丛书编辑部交办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初稿。这是军队和地方合作的一个成果。现征得广西军区军史编研室同意，将该初稿登载于本刊，广泛征求读者、特别是史事亲历者和专家的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史料立得更准、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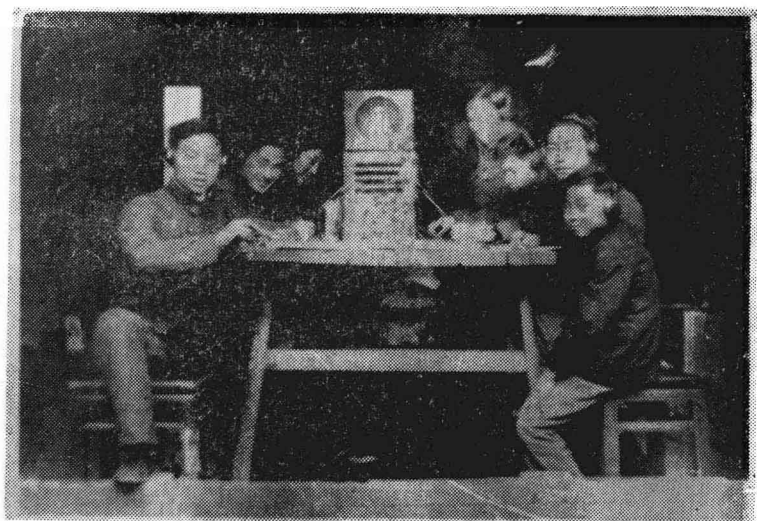


▷邱南章、殷承祯、赖祖烈
(左起)前往越南海防执行
运输任务前合影。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交
通科长龙飞虎在越南
海防执行任务。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电台人员在路莫村电台室工作。



◁《救亡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在桂林白面山印刷厂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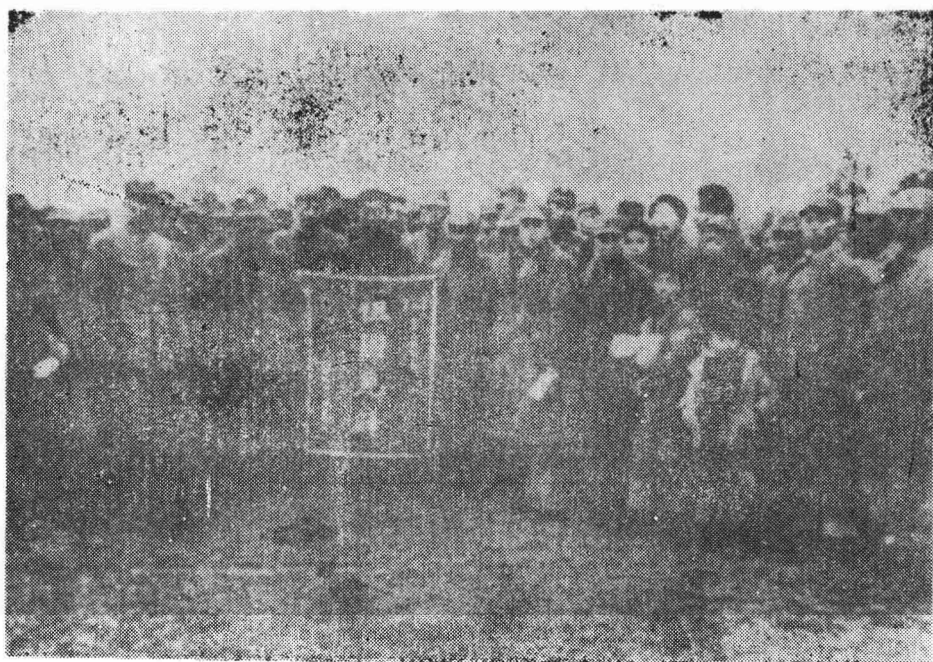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在路莫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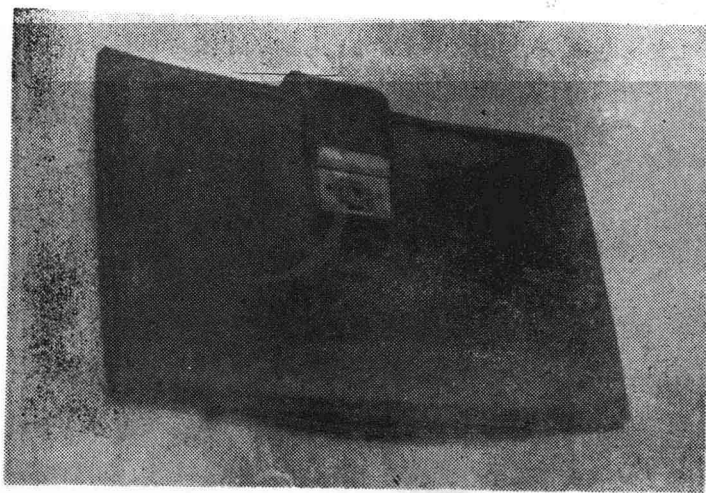


△1939年1月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在桂林接受香港同胞赠送的锦旗、汽车和其它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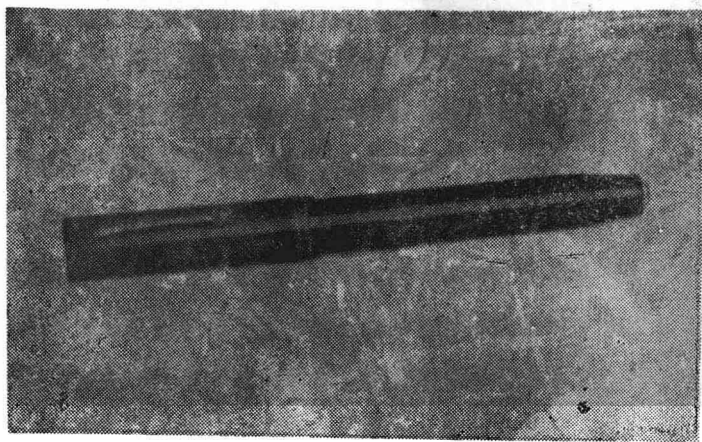
▽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向香港同胞回赠锦旗。



▷在桂林的新安旅行团西南工作队即将出发宣传。



◁这是周恩来在桂林使用过的公文包和钢笔。



（以上插页照片均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目 录

概述..... 编写组 (1)

●大 事 记●

一九三八年..... (9)
 一九三九年..... (11)
 一九四〇年..... (16)
 一九四一年..... (20)

●历 史 文 献●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组织分工及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等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21)
 李克农对中共中央指示电执行情况电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 (21)
 桂林办事处关于桂林通讯处工作报告致中共中央南方局电..... (22)
 李克农关于便衣队封闭生活书店情况致中共中央电..... (23)
 李克农关于新华日报被抄后的交涉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并中共中央的报告..... (24)
 就顽固派包围桂林通讯处并嫁祸于我李克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并中共中央电..... (24)
 李克农就广西当局和地方绅士等筹组中间集团问题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并中共中央电..... (25)
 李克农就何白要我撤销桂林办事处问题致周博叶并中共中央电..... (26)
 毛泽东对李克农关于撤退桂林办事处问题请示的批复..... (26)
 关于撤退桂林办事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 (27)
 李克农就军政部催我桂林办事处结束事致周(恩来)、叶(剑英)并毛(泽东)电..... (27)
 毛泽东对李克农关于撤销桂办问题请示的批复给周恩来转李克农电..... (28)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桂系的政策致叶挺、项英等电..... (29)
 李克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并中共中央电..... (31)
 李克农请示桂林办事处暂缓结束事致周(恩来)

本期特邀主编

韦秀康

张雨夏

冷德慧

主 编

韦文华

执行编委

彭源重

编 委

韦文华

秦丽华

梁 新

高 榕

彭源重

- 叶(剑英)并毛(泽东)电…………… (31)
- 关于桂林办事处撤退及转李任潮电李克农致周恩来并
中共中央电…………… (32)
-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事致周恩来转
李克农电…………… (33)

● 回 忆 资 料 ●

- 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曹瑛 (34)
-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日子里……………李金德 (36)
- 战斗在千里运输线上……………邱南章 龙飞虎 (40)
- 我在桂林办事处的一些经历……………龙 潜 (43)
- 随《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夏 衍 (46)
- 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潘 超 (54)
- 在桂林八办领导下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活动……………凌建平 (57)
- 峥嵘岁月 历程难忘
——回忆周恩来同志三次到桂林和皖浙之行
的情况……………邱南章 刘九洲 (60)

● 参 考 资 料 ●

- 国民党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社申请建立地方版分社
的复函(1939年10月4日)…………… (64)
- 国民党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桂林分社呈请变更名称
的复函(1939年11月13日)…………… (64)
- 国民党中宣部关于没收《新华日报》航空纸版的密函
(1939年11月13日)…………… (64)
- 国民党中统局调查桂林抗日进步文化团体的密函
(1940年 2 月)…………… (65)
- 国民党内政部关于《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分处再次要求
翻印航空纸版的公函(1940年 5 月 8 日)…………… (67)
- 国民党中宣部重申取缔翻印纸版的密电
(1940年 5 月 30 日)…………… (68)
- 国民党中宣部通飭各地严密检扣《救亡日报》函
(1940年 7 月 29 日)…………… (68)
- 国民党广西军委会新检处工作总报告(1942年11月)…………… (69)
- ※ ※ ※ ※ ※
顺应改革潮流 弘扬革命传统……………左超英 (74)

概述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设于国民党统治区西南战略重镇桂林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

桂林八办自1938年11月成立至1941年1月被迫撤销，历时两年多。内设秘书、交际、交通运输、机要、总务、财务等科和救亡室，总负责人李克农。桂林八办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利用桂林这个交通枢纽和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在发展桂系上层人物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关系，组织推动桂林的抗日宣传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领导建设中共广西地下党和联络华南及香港等地中共党组织，筹运军需物资和接送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华侨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发展广西上层统战关系促进与桂系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桂林八办建立以前，基于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国民党广西地方实力派，倾向停止内战、主张抗战的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长期存在的矛盾，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并与之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先后派中央代表云广英、张云逸向

桂系首脑进行了以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和抗战等的统战工作。此间，李宗仁也先后三次派其参议刘仲容到西安会见中共负责人，双方交换合作抗日的意见。刘到延安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3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与白崇禧有了更多的交往，曾向白崇禧提出了徐州会战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建议。白还接受周恩来的推荐，把毛泽东的新作《论持久战》发给桂军排以上军官研读。在武汉沦陷向南撤退途中，周恩来与白同行，一路上对白进行统战工作，赞扬了广西军队在抗战中的积极表现，希望他们抗战到底。之后，周恩来与白崇禧同上衡山开会，向白提出打算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希白坚持。同时表示：我们是你们的好朋友，不会挖你们的墙脚。白即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并答应回桂后请黄旭初交待有关方面保护桂林八办的安全。由于中共与桂系已建立统战的关系，因此桂林八办的建立，便成为双方保持和发展这种合作关系的纽带。

随着广州、武汉的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在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下，抗战态度日趋消极，寻求妥协、投降途径的意向日益显露出来。据此，中共为促进当局的进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用长期的国共合作支持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精神，桂林八办把发展同桂系的合作关系作为自己一项重大的和首要的任务。通过广泛的统战工作，争取广西当局实行更为开明进步的政

策，实行全面抗战，同国民党投降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斗争。

桂林八办建立后，中央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等，以办事处为依托，亲自做桂系上层的工作，通过拜会、讲演和个别交谈等方式，进一步融洽彼此的关系。周恩来曾三次到桂林，每次都会见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及各界人士。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利用到桂的种种机会，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路经桂林时，李克农设法安排徐拜会了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双方就有关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周恩来等同广西上层人士的密切往来，为桂林八办做好桂系的统战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李克农以桂林八办处长的公开合法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了消除桂系上层人物对共产党的戒心和疑虑，李克农曾与黄旭初作过一次坦诚的会晤。黄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并进一步向黄表明了中共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内部政务，不挖广西的墙脚。为使统战工作能够进入桂系的核心，南方局和桂林八办通过早已在桂系上层人物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的作用，通过合法安排共产党员进入桂系军政部门的方式，加强了对桂系上层人物的接触和影响。李克农指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崇禧）身边”。并于1939年3月，向谢传达了周恩来提出的对桂系统战的原则，要谢鼓励李宗仁、白崇禧坚持长期抗战，认清蒋介石的政治嘴脸，防备蒋系特务侵入，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

策”，保护爱国人士和进步团体。同时，要谢加强对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行营白崇禧办公室参议刘仲容的联系，按照周恩来早时的指示，把刘“当作党内的同志一样信任”。从而，使谢和赓在发展与桂系的统战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此外，桂林八办还指示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共党员周可传、侯甸，要千方百计进入桂系的核心。之后，周可传被安排在广西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任组训组组长，侯甸任国民党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中校科员，从不同的渠道对桂系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

桂林八办还十分注意做桂系中民主派人士的工作。如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士，他们虽无实权，但却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桂系当中也有较大的影响。他们在思想上比较接近共产党，对共产党持友好合作态度，在广西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民主力量。李克农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一些对当局首脑不便直言的问题，请他们代言，通过他们去影响桂系上层人物。

此外，在桂系举办的一些团体机构中，桂林八办都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去开展工作。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桂系的一个反蒋政治组织，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主持日常会务的是桂系民主派李任仁、陈劭先。李克农趁该会招聘会员之机，通过李、陈的关系，派遣和引荐了许多党内外专家学者入会。如胡愈之、杨东纯、邵荃麟、范长江、夏衍、张铁生、张锡昌、姜君辰、金仲华、李达、李四光、张志让、千家驹等，都被聘为会员。胡愈之和千家驹还分别担任了该会文化部和经济部的副主任。谢和赓和刘仲容也是该会政治部的研究员。根据李克农的指示，他们将该会各方面的情况、动向，及时向桂林八办汇报。1939年初，国民党广西当局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介石乘机派亲信来广西发展其

特务势力。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桂林八办决定派共产党员到广西三青团协助广西当局抵制蒋介石特务的渗入。三青团正式成立时，桂林八办除直接派周可传、陈贞嫔进入领导层外，还指示中共广西省工委，先后派出100名党员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15个县的分团部工作。要求这些共产党员宣传抗日、民主、进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努力把广西三青团办成进步青年群众的抗日组织，并用合法方式掩护中共广西地方党的工作，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国民党广西当局为了巩固其统治，弥补干部不足，决定设立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训练培养基层干部。在李任仁的推荐下，黄旭初邀请中共党员杨东莼出任干校教育长。李克农指示杨东莼，要以干校为据点，安置撤退到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抗战人才。杨东莼为此曾向路经桂林的徐特立请教了有关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并与徐共同制定了广西地干校的教学训练方针和教学计划。桂林八办通过杨东莼还安排了一批外省籍和广西籍的中共党员。如周钢鸣、姜君辰、司马文森、郑恩、张海鳌、杨江、路璠、毛恣观等，到干校担任各部门行政领导和指导员，组成省外省内两个不发生横向关系的中共支部。周钢鸣任外省籍支部书记，负责杨东莼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干校办学两年，先后接纳了中共党员120多人，以及一大批进步文化民主人士。由于共产党员掌握一定实权，中共的方针政策可以用合法的行政方式予以布置和贯彻执行，使该校一度被誉为“华南的抗大”。在此期间，桂林八办还支持广西当局组建一支4200人的学生军，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了100名党员参加，分布在23个男生中队和3个女生中队。这些工作，对于密切与桂系上层统战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由于桂林八办对桂系上层展开了多层次的统战工作，在抗战初期使广西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中共的刊物，毛泽东的著作可以在书店公开出售；中共的抗日主张在街头可以公开演讲；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桂系上层还与桂林八办建立了联络关系，有问题均通知协商。白崇禧在桂林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和招待文化人士的演讲稿，就是由桂林八办起草的；广西三青团干训班曾主动邀请南岳游击干训班八路军教官李涛去讲课。白崇禧曾公开表示：“对共产党，广西采取不拒绝的态度”^①，要“作之君，作之师”^②。

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桂系仍采取合作或保持中立的态度。1939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后，白崇禧在答复中共的抗议时表示：“所陈如果不虚，殊属非是，明电告薛长官彻查惩治。”^③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投降活动，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广西当局表示同情中共的主张。这年冬，山西新军脱离阎锡山，转向八路军。对此白崇禧尽管内心不满，但表面上，对山西问题仍表示不管。1940年初，原属桂系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被蒋介石拉拢，积极参与反共，在皖北取缔抗日救亡组织，迫害进步青年，制造磨擦，进攻新四军根据地，受到新四军的反击。对此，桂系当局没有对中共撕破脸皮。白崇禧认为，李品仙已坐上国民党“CC”派的轿子，并表示对安徽的地盘，要巩固现有阵地，已被新四军占领的区域，亦暂不争夺，静待中央合理解决。这种较好的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1940年5月。这个月，广西成立了以黄旭初为首的“宪政协进会”，赞同中共提出的民

主宪政，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宪政协进会的成立宣言，就是由中共党员胡愈之起草的，经黄旭初、白崇禧审定后，先后在《建设研究》、《广西日报》和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发表，在海内外影响甚大。

广泛团结各界文化人士 推动抗日宣传文化运动的发展

由于广西当局对抗日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及中共党组织有意识的安排，广州、武汉沦陷后，数以千计的文化人云集桂林。其中全国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不下二三百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欧阳予倩、陈翰笙、熊佛西、焦菊隐、洪深、丁西林、叶圣陶、王鲁彦、邵荃麟、艾青、艾芜、千家驹等等。一批文化团体、协会应运而生。其中较著名的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支会桂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等等。这些团体协会的活动非常活跃，经常举办各种抗日时事专题讲座、演讲会、学术座谈会，组织文化人著书撰文，号召人民起来抗战卫国，这就为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桂林八办的建立，延续了武汉八办时期领导抗日文化和救亡运动的工作，加强了对这些社团的联系和影响。

桂林八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中共组织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的指示精神，把广泛团结各界文化人士，推动文化运动的发展，经常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文化运动的限制和迫害，桂林八办支持和领导了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反对国民党中宣部的《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9年3

月10日，李克农在《救亡日报》上撰文，要求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对第二届参政会中通过的邹韬奋等74人提交的《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之决议案，要“全部付诸实施”，呼吁政府取消新闻事前检查，以尽其为民喉舌的天职。与此同时，桂林八办还在各种场合，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中共抗日的原则立场和抗日文化的方针政策，使之为广大文化人士及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接受，从而支持拥护中共的主张，投身抗日文化宣传的洪流。李克农、吴奚如、龙潜等，经常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出席各种招待会、座谈会和群众集会，进行讲演。他们还带领桂林八办其他工作人员，编演抗日剧目，出版墙报，街头讲演，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的思想，批判各种有害抗日的错误言论，发动群众参加抗战。

桂林八办还通过文化团体中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广泛团结各界文化人士。当时在桂林的许多抗日救亡的文化团体都建有受桂林八办直接领导的中共党支部，如《救亡日报》社、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生活教育社、国际新闻社、桂林中山纪念学校、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剧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抗敌演剧九队（后改剧宣五队）、抗宣一队（后改剧宣七队）等。这些分布于新闻、出版、文艺团体的中共基层党组织，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照桂林八办的指示，对所在单位实施正确的领导，使这些单位成为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利用自己的合法性，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最新论著。通过发表社论、时论和消息，宣传中共的主张，阐明中共的立场和观点，报道解放区、敌后游击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民群众英勇抗战的事迹。

桂林八办还指导与之单线联系的、在文化界有影响的秘密共产党员，发挥他们的模范骨干作用，影响和带动各方面的进步人士，投入抗日宣传文化活动。1939年10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理事中，就有共产党员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等。他们认真执行中共的文化工作方针，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使该会成为受中共影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文艺团体。这个协会，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多次召开有关文艺运动方面的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举办文艺讲习班，开展保障作家创作自由和著作权益的斗争等各项活动，把一切愿意抗日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桂林文化供应社名义上是广西当局办的出版机构，由李任仁任董事长，陈劭先任社长，陈此生任总务主任。但其所用干部大都是李克农推荐的，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胡愈之、傅彬然与民主人士张志让先后任编辑部主任，邵荃麟、姜君辰等任编辑。由于这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里面起了积极作用，文化供应社曾出版过不少农村抗日读本和通俗读物，销路很广，宣传和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

对一些国民党中央控制的新闻、文化机构，桂林八办也重视做好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如国民党中央社广西分社、国民党中央新闻检查所及国民政府军委会直属的以反共著称的《扫荡报》等，桂林八办就通过夏衍对他们做统战工作，使《救亡日报》与中央社广西分社的关系相处得较好。就连《扫荡报》总编辑钟其森也对夏衍表示：不会在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他对《救亡日报》也表示友好。一些团体中的进步份子“以进到八路军通讯处为荣耀”。

在桂林八办的领导和支持下，桂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文化新军，抗日文化宣传和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当时的桂林，新闻事业空

前繁荣。先后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达13家之多。其中日报6家、晚报4家、小报3家，此外还有10多个新闻机构。其中《新华日报》被时人称为“漓江灯塔”。《救亡日报》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书店出版业盛极一时。抗战新音乐运动得到了空前普及。《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在大行山上》、《游击队歌》、《丈夫去当兵》、《壮丁上前线》等抗战歌曲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当时的桂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抗战的歌声。戏剧演出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桂林有10多家剧院，先后到桂林演出过的戏剧团队有70多个，经常有新剧目在桂林上演。美术创作繁荣，形式多样。著名画家徐悲鸿、关山月以及盛特伟、廖冰兄、丰子恺、余所亚、黄新波、赖少其、陈烟桥等名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受群众喜爱。他们还培养了一支群众美术宣传队伍，创作了一批控诉日军罪行，针砭时弊，歌颂抗战的好作品，使艺术成为群众掌握的抗日思想武器。此外，科技、教育、舞蹈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桂林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因此，桂林曾被誉为“抗日文化城”。

利用公开合法地位发挥中共华南党组织联络中心的作用

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同时决定在桂林设办事处，其机构、任务由桂林八办成员组成和承担。在实际斗争中，桂林八办利用自己公开合法地位，以及桂林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特殊的政治环境，发挥对湘、赣、粤、桂及香港等地中共党组织的联络作用。

中共广西省工委原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桂林八办建立后，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即将广西省工委的组织关系交给李克农，广

西省工委遂由南宁迁桂林，直接在桂林八办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刚与桂林八办接上关系，即受李克农指派，带领部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到衡阳参加南方局举办的党训班，学习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方针政策。之后，李克农又指示广西省委在一些地方开办训练班，训练党员骨干。在广西党的组织工作方面，桂林八办根据与桂系进行统战工作和不同形势的需要，对广西省工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组织，适时进行必要的调整。1938年底，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的精神，指示广西省工委撤销原在广西学生军各团建立的总支和支部，党员改为单线联系。之后，又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关于广西党组织，不忙发展党员，工作应放在下层的指示，桂林八办指示广西省工委在全省不建立新的组织，暂不发展党员，并建立了一个三人组成的省工委。1939年7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决定，撤销广西工委，全省划为桂林、梧州、南宁三个特别支部。这一时期，中共广西各地党组织根据桂林八办的指示，派出占全省党员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共产党员，进入广西学生军、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三青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战时工作团等广西当局建立的各种团体和组织，有力地配合了桂林八办对桂系开展的自上而下的统战工作和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6月以后，广西当局开始反共，桂林八办指示中共广西党组织，重新发展党员，并在年底重建省工委。直属桂林八办领导的，还有在桂林的文化团体、学校、工厂等单位的20多个中共党支部，以及胡愈之、杨东莼、夏衍等一批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桂林八办与这些单位的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经常保持着密切联系，帮助他们学习，指导他们开展工作。1939年2月，周恩来途经桂林，传达中共六

届六中全会精神，桂林八办通知这些党员参加听讲，使他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1939年秋，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李克农向在湘桂等地活动的文化界党员传达南方局的指示，要求党员要坚持原则，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如遇到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可拖则拖，拖不下去，可集体加入，以避免上国民党的圈套。

桂林八办为加强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华南各省党组织的联系，建立了严密的交通和电台联系网络。常设的交通员有李沛群、王华生、曾昌明等人。交通线有：桂林——梧州——台山——澳门——香港，香港——汕头——潮安——丰顺——兴宁——韶关——衡阳；桂林——广州湾（今湛江）——香港，桂林——镇南关（今友谊关）——河内——海防——香港等。通过这几条交通线，传达党的秘密文件和情报，护送重要干部往来。桂林八办设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套电台，可以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八办、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等地直接联系。中共粤、赣、湘、琼省委、特委没有装配电台之前，主要是通过交通员进行联络。各省委遇有重大问题，则由主要领导干部到桂林，通过桂林八办的电台向南方局汇报，接受指示。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赶到桂林，即向李克农汇报平江新四军通讯处人员、物资损失等情况，共同研究向国民党交涉的意见，并电告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同时告诉有关省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办事处（通讯处）提高警惕。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到南方各省。桂林八办及时地把郭潜关于蒋经国在赣南进行反共活动的情报，和中共赣南特委宣传部长陈训涛被捕和损失情况，中共粤北省委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行反共大搜查的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了汇报。9月，八路军驻湘

通讯处处长王凌波夫妇被国民党逮捕，驱逐到桂后，桂林八办接待和安置了他们，同时将情况电告南方局，并提出应向蒋介石抗议的建议。1940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桂林八办先后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琼崖纵队，中共广东、湖南、江西省委建立了秘密电台，并为这些电台培训了一批报务员，大大方便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华南各地中共党组织的联系。

桂林八办在加强与华南各地中共党组织联系的同时，还认真做好同国际兄弟党及国际友人的联络。1938年，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化名胡光），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后途经桂林，等待回国机会期间，桂林八办为其开展越南革命活动提供了条件和帮助。受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的琼·尤恩大夫，苏联《消息报》驻华特派记者卡尔曼，日本著名作家、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亘，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德国籍成员王安娜，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等外国同志和友人，都受过桂林八办的接待、支持和关照。

桂林八办还是中共党内、军内人员来往和物资转运的中心。除南方局和各省领导人外，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南洋各地的华侨干部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都是由桂林八办护送到八路军、新四军的。通过桂林八办转送到延安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爱国青年有上千人，有时安排在北郊的路莫村住宿的就有三四百人，大部分村民家里都变成了临时接待站。

广州沦陷后，香港八办和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新四军在香港和海外筹集到的大量物资，大多是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海防，经河内运至桂林，再分别运到延安和新四军。桂林八办曾多次派人去越南接收和转运物资。1939年5月，桂林八办派人入越接运香港八办筹购的一大批物资，其中有无

电广播器材30大箱，汽车10辆，被服20大箱，汽油7000加仑，以及一批医疗器材。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这批物资安全转运到延安。廖承志在香港筹集到的款项也大多汇到桂林，尔后由桂林八办通过在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的秘密共产党员施振，设法接收和转汇到各地中共党组织。

1939年，桂林八办派人到柳州为新四军领取军毯。由于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已下有禁令，而遭到刁难。后经多方交涉，据理力争，终于领到了20,000条美制毛毯，并顺利运到新四军。

把握广西政治形势逆转动向 争取中间力量相机做好应变工作

1940年初，蒋介石加紧了对桂系采取一打一拉的“软化”政策。同时，由于广西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在抗战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但常会显露其反共本性。1940年2月，蒋介石借口白崇禧对桂南会战指挥不力，将白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5月，蒋介石撤销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将白调重庆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置于蒋的直接控制之下。蒋还通过何应钦给白施加压力，使白逐渐从中间立场转向反共立场。

1940年3、4月间，广西局势开始逆转。3月13日，《新华日报》被查抄。不久，新知、生活两书店邮寄的书籍无故被扣留，《国民公论》的稿件被横遭删改，反汪火炬游行被制止。反共顽固分子对桂林八办进行包围，强迫迁走桂林八办近邻三家居民，换上特务分子居住，以便对桂林八办进行监视。顽固派利用中央电厂职工的自发工潮，散发阴谋传单，诬蔑桂林八办煽动工潮，借此挑拨桂林八办与广西当局的关系，以达到取缔桂林八办的目的。1940年6月，白崇禧在广西省临时参议会上公开反共，要

共产党“适可而止”。白到重庆后，不断电令广西当局注意防止异党活动，

1940年6月，李克农亲自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广西政治形势的动向和桂林八办的工作。6月22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肯定了桂林八办的工作成绩，但指出有太暴露的弱点，明确桂林八办今后在广西的工作方针，不仅要积蓄力量，还要发展力量；要拥护进步力量，联络民主力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桂林八办继续争取桂系上层人物，特别是加强对广西民主派人士的联络统战工作，力争广西向有利于抗日进步的方向发展。李克农如常登门拜访黄旭初，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40年7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黄在会上未作公开反共的讲话。黄回桂后，他认为国民党中央同中共会谈无诚意。1940年9月，与中共早有联系的民主人士李济深被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后，桂林八办即将他以及在广西有影响的民主人士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李克农经常拜会李济深，向他阐明在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中，中共仍继续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以桂军作反共先锋是借刀杀人的政策。还派新安旅行团为其祝寿。李济深在当时广西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仍然对桂林八办和进步文化人士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持。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也给予中共和文化人士以同情和照顾。对朱德、彭德怀等驳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所发出的“佳电”，李任仁认为“写得很好”。对新四军陈毅部挫败韩德勤的进攻，陈劭先认为“是一件极痛快的事”。在他们主要负责的广西三青团、广西建设研究会、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文化供应社等团体机关，他们为掩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解决其困难，做了一些可贵的工作。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

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皓电”，同时密令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到桂林八办催逼其结束。白崇禧充当了蒋介石的反共急先锋。桂林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桂林八办面对随时可能突发事变的形势，进一步加强了内部防范措施，对党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组织纪律和革命气节教育，拟定了党员和工作人员秘密守则，做好应付突变的准备。同时对中共广西党组织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隐蔽、转移、撤退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指示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当局保护的，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共产党员和《救亡日报》的骨干，则分批撤往香港。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为保留桂林八办这个统战工作的据点争取时间，并给安排桂林中共组织及进步文化人士疏散转移留有充分的余地，指示桂林八办在“撤销”这个问题上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11月3日、12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到桂林八办催其必须在本月19日前结束，并要桂林八办先递“自动呈请撤离公文”。13日，毛泽东根据桂林八办的有关请示及时复电，明确指示：第一，要向军政部桂林办事处申明，我皖南部队准备遵令北移，在执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暂难结束；第二，如彼方要马上结束，则请军政部来一正式公文。电文还指示说，我方做上述表示后，对方如不答应，则让其关闭为有利。但我内部须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11月下旬，军政部桂林办事处再次派人催逼桂林八办立即撤销。次日，李克农向中央建议，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提出延长时间，或改设运输站。得到中共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即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名义请李济深交涉和疏通。但此时李济深也无能为力。他在给李克农的复电中说，务希即通令新年终撤销。此后，

大事记

1938年

9月

本月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关于武汉将会失陷的预测和拟向西南后方发展的意向，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刘恕到桂林为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作准备工作，并委托民主友好人士熊子民随同前往，予以协助。

10月

22日 日军逼近武汉。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带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撤离汉口。

23日 李克农一行所乘轮船新升隆号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时，遭日军空袭，船上24人遇难，其余同志改乘木船继续西行，分

他考虑到形势十分危急，曾派人给李克农传信：“克农即走”。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多次给南方局和桂林八办来电，对形势和桂林八办、文化人士的转移作了明确的指示。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并转李克农电：桂林八办应立即撤退，否则李克农会被拘押。20日，桂林八办关闭。随后，李克农带领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去重庆。沿途将中共中央军委就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和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传单广为散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

别辗转到达长沙、重庆。

25日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转移长沙途中，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同行相谈，开展统战工作，希望白崇禧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抗战到底，做民族英雄。

11月

月初 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李克农、吴奚如等组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0日 中共党员、《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根据李克农的意见，到长沙向周恩来请示该报在桂复刊之事。周恩来指示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并负责与各地演剧队的联系工作。

上旬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将中共广西党组织关系交给李克农，中共广西省工

桂林八办虽然被迫撤销了，但是两年来桂林八办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业绩，在西南大后方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它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与人民取得广泛的结合，进一步坚定了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后来桂林地区抗日进步势力的继续发展，以及抗日文化运动在桂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和力量。

（编写组）

注 释：

- ① 桂林八办致中共中央、南方局电，1939年6月15日。
- ② 李涛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6月6日。
- ③ 李克农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7月29日。